

第 | 四 | 章

《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出走与归来

第一节 走上西学之路

1902年,容闳再次回到美国定居,在此后的几年里,他完成了自己的个人传记《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并将其在美国公开出版。《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成为这位走向西方的先驱者的代表文字,其中记载了他个人的人生足迹,而他对人生的回忆,不仅为历史增添了颇有意义的见证,也为后来的中外读者提供了一条解读历史、了解中国近代历史上一类特殊人群的途径。具体而言,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这位“中国留学生之父”的成长经历与丰富的人生阅历,了解其心志的养成与人生追求,并通过他所亲历与见证的重大历史事件,一窥历史的风云。

《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全书共22章,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容闳回顾了自己的求学经历。容闳出生于中国内陆最早受到西方势力影响的广东地区的香山南屏镇。南屏镇距沦为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门不过数里之遥。当时,传教士郭实腊夫人在澳门开设了教会学校,容闳7岁时,即1835年,被家人送到该校读书,这似乎预示着他未来的人生必定会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分不开,盖因为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嬗变的初期,此嬗变的内容之一即是西方势力在中国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外交,而日趋扩大到民间社会,尤其是沿海民间。容闳说当时家里的决定背后已经显示出了一种社会风俗的变化,是“为时世

所趋”，“通商而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吾父母欲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乎？”^①在容闳进教会学校读书的同时，他的兄长仍在旧塾读书，走传统“仕进显达”之路，这也反映出在当时嬗变之初，社会风尚处在变与未变之间。

就全国观之，广东沿海一带受西方影响最早，所以得开风气之先。东南沿海的西化程度当时较江浙沿海更高，我们不妨以晚清另一个最早接受西学影响、与容闳大约同时期的王韬为例做比较。出生于江苏角直镇的王韬一生也与西学相涉，不过他从小受的是正统教育，“少承庭训，自九岁迄成童，毕读群经，旁涉诸史”，“十二岁学做诗，十三岁学作笺札，十四岁学作文”，后试科举不中。^②这种经历决定了他后来的人生虽然与西学相涉，但终身并不以此为荣，反而多感遗憾。在上海与传教士一起译书时，他就曾感叹“韬逐臭海滨，为西人佣书，计非得已”^③，“恐日复一日，华风将浸成西俗，此实名教之大坏也”^④。其悔意之重，至感叹“此足一失，后悔莫追”^⑤。而容闳一生则从未对自小走上西学之路有过后悔，相反，他时时自觉地以西学为根基和良途，为促进国家的富强做出贡献。

容闳在郭实腊夫人所办学校读书仅两年就转入另一所教会中学，即为纪念英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马礼逊而办的马礼逊学堂。马礼逊学堂原在澳门开办，后迁到香港，容闳的足迹由此也从澳门到了香港，从这里，他走出了国门。该校校长美国传教士布朗于归国之时愿意携带三名学生赴美，资助其继续学业。容闳成了这三名学生之一。少年远行，况且是漂洋过海，虽然是机遇，但对于他们的亲人而言实在是艰难的选择，容闳的母亲当时是流着泪答应的。到美国后，容闳等进入美国东部马萨诸塞州内的孟

① 本章引用《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均出自容闳. 西学东渐记. 恽铁樵, 徐凤石, 译.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② 王韬. 弢园老民自传.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17.

③ 王韬. 弢园老民自传.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30.

④ 王韬. 弢园老民自传.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35.

⑤ 王韬. 弢园老民自传.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78.

松学校(Monson Academy)就读。中学毕业后,他进入耶鲁大学。在漫长的求学生涯里,容闳遇到的主要困难,一是经济问题——虽然能得到一些资助,但容闳还得靠校园内的勤工俭学所得来完成学业;第二个困难,是因基础不好而微积分课程学得很吃力,虽努力于此,但毫无改进。好在他在英语方面表现出众,以英语课的好成绩去补微积分课的不足,最终也得以顺利毕业。《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记述他在美国求学的经历虽只有两章,要言不烦,但足以让我们了解他如何得以获得首位“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的成就。

大学毕业后,容闳决定回国,开始了以报效国家为处世原则的职业生涯与社会活动。全书绝大部分篇幅记录他此后的人生足迹。他记叙的主要事迹包括最初在香港和上海的谋生,其中最可注意的是他到内地产茶地区考察的经历,因为此次经历不但使其在商务方面积累了经验,更重要的是使其进一步了解了国情。接下来,他又考察了其他很多地区,7个月走下来,途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安徽,他“得略知内地人民经历太平军乱后之状况”,在了解到当时经历过内乱的内地人民的艰苦生活后“生无穷之感慨”。广大乡村,人口凋零,百业不振,与他过去以为的中国人口稠密的情形形成极大反差,这深深刺痛了他。

从内地回来后,容闳人生中又一大事发生了。1860年,他与两个美国传教士一起到当时由太平军控制的南京去“访察”。此访察的目的是想知道“太平军中人物若何?其举动志趣若何?果胜任创造新政府以代满洲乎?”也就是想知道太平军能否担当起推翻清政府而推动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的历史使命。容闳向太平军洪仁玕提出了7条建议,可谓是有备而来,也说明他确实曾寄厚望于太平军。在第11章,容闳细述了他对太平军的认识。他对洪秀全的看法显然是出于基督教的角度,一则认为太平军起义“以宗教观念为原质”,又认为太平军对基督教的认识“皆甚浅陋而简单”。这也反映出容闳的文化立场属于西方资产阶级性质。他对太平军的认识几乎与曾经也寄希

望于太平军的王韬相似,即认为太平军不能成革命之大事。太平军虽然失败了,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革命,但容闳认为其有利于动摇“中国顽固之积习,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而有新国家之思想”。

南京之行后,容闳曾组织商运太平军控制地区的茶叶到上海,其过程颇为惊险,结果使他在商界获得良好的声誉。这件事过后不久,他得到曾国藩的招纳与赏识,加入到洋务运动中。在关停了自己在九江的生意后,他于1863年秋来到安庆,得见曾国藩。“抵安庆之明日,为予初登政治舞台之第一日。”容闳在书中详细描述了改变他人际遇的这一天,记下了曾国藩给他留下的美好印象和对他的知遇之恩。在曾国藩问计于他时,他建议建造机器厂,这一建议得到采纳,他被委以重任,到国外采购所需物质。从第13章开始到书的结尾,占全书近二分之一的篇幅均记述他得曾国藩招纳后的作为。这些作为包括赴海外采购机器、促成并协办派遣120名幼童到美国留学、赴秘鲁调查华工真实生活状况、力促筹建银行和铁路等。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促成清政府向海外派遣留学生计划,这件事倾注了容闳的心血,寄托了他以所学报效国家的夙愿。可以说,容闳等这样的一个人几乎用了大半生的时间。这一抱负的实际内容就是“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他在书中细述了如何提出建议,如何得遇机会实行计划,以及作为监督在美的生活和留学项目的提前终止。围绕出国项目,容闳在笔墨之间,也有一番表露心迹,臧否人物。

第二节 西学东渐:个人经历与时代的交错

《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不仅仅是对容闳人生印迹的记录,更是对某种人群的集合刻画。容闳虽然是留学之父,但并不是另类,在其所处的时代,他已经成为一类人群的代表,他个人心志的养成也反映出一种中西隔膜与融合的范式的出现。如果说容闳是最早走出国

门而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个人,那么,清末民初不少人在西学的冲击下开始睁眼看世界,或直接走出国门,正是因这种情势所向。今天回头看,当时若没有西学的传入,则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必不可能启动。然而,西方的影响到底是否能完全颠覆中国文化传统,西化的“新”是否是对中学的“旧”的替代,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通过对容闳个人心路历程的剖析,我们得到一个机会,得以一探大历史下个体的存在是否能顺应大历史的发展,为我们解释历史发展的规律提供有益的帮助。

个人传说更易于表达情感,而不是单纯对历史事件的记载。容闳在书中记述事件,本身已经是有所偏重与弃守,这些文字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出生于中国乡村的穷孩子如何成长为一个新人,了解了在这一过程中他丢弃了什么,又获得了什么。幼时的容闳是被父母送进教会学校的,这并不是他的个人选择,周围的环境使得他的父母做出了这种选择。在送容闳进教会学校的同时,却把另一个儿子留在旧塾接受传统教育,所以容闳说当时他对父母的决定“百思不得其故”。而以后的人生经历“似为时世所趋,或非予父母所及料也”。进入教会学校以后,容闳果然成长为“一个完全由外国人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①。容闳对施于其恩惠的教会是充满感激之情的。谈及母校马礼逊中学,他感慨学校的简陋:“以玛氏之丰功伟烈,而纪念之成绩,乃不过如是,庸非一憾事哉!”回忆自己的成长历程,他坦言:“俾予得受完全之教育,盖全为基督教慈善性质,并无它种目的。”他对一些美国传教士的评鹭也反映出发自于内心的感激之情,从无半点掩饰。譬如他对布朗等美国传教士的描写,盛赞不已之下无疑显示出一种情感认同。基督教对容闳影响之深远,已经成为他认知的出发点,这说明了容闳身上西化之深。如他批评太平军的失败,就认为太平天国起义“徒令耶教中人为之失望,于宗教上毫无裨补”。

然而,说容闳完全成为了一个外国人,则又完全脱离实际。虽然

^① 胡绳.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54.

容闳的学养来自西方教育与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从赴美读书始,容闳就已经决定将自己的事业放在祖国。虽然他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并不短,断断续续有近40年,而且还加入了美国籍^①,但是整本回忆录所记述的主要还是他在中国的生活,少部分关于他在美国生活的文字也基本上围绕他与留学计划的关系。这部传记虽然以英语写成,但其影响却主要在华人读者和华文读者,这既与全书的宗旨相吻合,又与全书成于英语、在美国出版这一事实相隔阂。对于美国,容闳虽然也有着十分的眷恋,但他在这本晚年回忆录中坦言:“美国实余第二祖国也。”言下之意,美国于他一生有非凡的意义,但他心所系更在于中国。或许可以说,脱离他在中国的事业,那么他的生活将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在容闳的叙述中,有两个关口对他的人生走向产生了非此即彼的影响。一个是他在美国中学毕业后,为获得资助从而完成大学学业,他曾经向所读中学求助,学校答应给他资助,但有一个条件,即“须先具志愿书,毕业后愿充教士以传道”。如果容闳接受,则意味着他将成为传教士,毕业后将回中国传教。虽然他当时急需获得资助,但经过认真考虑,他还是拒绝了。从那时候起,他其实已经在策划将来回国服务事宜:“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合格品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录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以竟吾素志。若限于一业,则范围甚狭,有用之身,必致无用。”一旦签了合同,则必然身不由己,“将来虽有良好机会,可为中国谋福利者,亦必形格势禁,坐视失之乎?”另一件事则是从大学顺利毕业后何去何从,他要做一个选择。当时,他是希望留在美国继续深造的,然而,一来资费难以为续,二来当时他的美国朋友都希望他能回国传教,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回国。本来容闳也早有归国服务之心,而且他心中已经对自己的事业有了较清晰的计划或构想:“盖当第四学年中尚未毕业时,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画大略于胸中矣。”

^① 关于容闳是否加入美国国籍目前还存有争议,本书依据容闳在自传中所言。

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也就是从此时开始，他日后所作努力，都是为了促成清政府派遣留学生这一项目，而这一努力的终极目的，就是为祖国的富强做出贡献。他的人生方向，也从此确定下来。显然，容闳的一生，其人格的西化是与其爱国主义的心路历程重叠不悖的。

容闳爱国主义精神的基础是他从睁眼看世界的角度看到了民族与国家的艰难处境。还在美国留学时，他每当想到国内的腐败落后，“辄为之怏怏不乐……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遂有借西方文明来“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的理想与抱负。归国后，他看到的是饱受内乱之苦的广大民众，当亲眼目睹清政府对广东天地会起义镇压时的滥杀无辜时，他更是悲愤难抑，对太平军起义“几欲起而为之响应”。为实现自己的抱负与理想，他不断拒绝功利的诱惑，培养自己的毅力。归国后，他尝试过从事不同职业，如做律师等，但最终都放弃了。究其原因，有的是因为“纵使成一著名律师，博得多金，亦安所用之？”有的是不愿同流合污、贪图安逸。他冒着危险到战区贩运茶叶，虽无利可得，却证明自己能“任难事而坚忍，遇危险而能镇定”。

总结容闳一生的作为，不得不说，他虽然以务实的精神积极参与当时的社会改良活动，但由于个人与时代的因素，少有获得圆满结果的，取得的最大成就还是在促成清政府向外派遣留学生上。容闳对此也是清楚的，在书中，他的叙事实际上是围绕着这项工作展开的。可以说，容闳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过教育兴国的口号，却是以实际行动做出了教育兴国的努力。如果说，在大学毕业之时，他已经对如何让更多人接受西方文明的熏陶有了笼统的考虑，所谓使后来的人能像他本人一样受益于西方教育，从而达到“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目的，那么，1863年，当大权在握的曾国藩招纳他前往时，他则是出于借助曾的权力与影响使他的教育

计划“当不患无实行之时”的考虑,才决定投入曾国藩帐下。初次见面,他见时机尚不成熟,“乃将教育计划暂束之高阁,而以机器厂为前提”。这就是说,他最初的笼统想法在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具体的计划,此时距他回国不过近十年,正是从青年过渡到中年的时节。数年之后,容闳将自己的计划告诉了江苏巡抚丁日昌,得到丁日昌的赞成,并经其条陈清政府。此计划具体内容是由政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第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不难看出,这样的计划当时只能是像容闳这样的人才能想到,盖因为容闳本人就是13岁时留学美国,足以为一个活例证,证明派出幼童留学的意义与功效。容闳的计划最终得到曾国藩等大臣的同意,并经其上奏清廷。容闳从丁日昌处得知大事可成,“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到1870年冬,曾国藩等所奏终于得到批准。容闳得闻此讯,称其“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事过境迁,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容闳当年的努力,在清末国运不兴的背景下确乎宛如一声新雷,真正令人发无限历史的感慨!

按书中所记,清政府在批准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后,又设立了事务所。事务所的组成人员包括监督两名,汉语教师一名,翻译一名,容闳被委任为监督之一。从此,容闳全身心投入到这项他为之奋斗半生的工作中。经多方努力,终于在1872年夏末,中国派出了第一批学生30人。而此前半年,曾国藩去世,容闳在书中对这位帮助他实现理想的清大臣满是敬仰之言,甚至称其人品如珠穆朗玛峰之独立于群山之上。显然,容闳得曾相助而怀感恩之心,尤其晚年回忆到后来派遣留学生计划在各方阻挠下半途夭折,大概更让他感念曾的好处。

而那些未能在留学计划上给予积极帮助的人和反对将留学计划坚持下去的人,他都做出了较低的评价,这些人包括李文忠、陈兰

彬和吴子登等。容闳在自序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接下来的几章专门用来阐述我苦心孤诣地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这是我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随着中国留学事务所的突然撤销和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先行者的一百二十名留学生的召回，我的教育事业也从此而告终了。1872年那批留学生的仅存者中，有几人由于艰苦努力，勤奋不懈，终能跻身于中国重要的经世之才的前列，而且正是由于他们，原先的留学生事务所也复活了，虽然形式上已有变更。因此，如今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学生翩翩联袂，从遥远的海角天涯，来到欧美接受科学教育。”从中我们能读到作者心中的沉重，也能读到作者在一百年前对一个新中国的不无乐观的期望，这些沉重与期望虽然出自一个横跨中西语境的知识分子的个人视野，但通过这一视野，我们不是也能看到清末中国社会的沉重与希望吗？

作为一本传记著述，《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为我们展示了别样的人物，展示了清末民初一个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新式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与情感世界，他比之前和同时代的人在向“西”看上走得远，在借取西方文明来开创中国的新时代这一事业上，他是少数先驱者之一，他的生活与事业都堪为一种典型，在个人身上多方面折射出了一个时代的风貌。主人公的成长历程，他的成就与局限，与其说是个体的选择，不如说是时代的驱使，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历史的诠释。譬如他努力以西方文明来改造中国的背后，是他对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隔阂，他未能认识到，他简单地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套之于中国，以西方文化为社会改良的标准来改造中国，注定会使他的努力难以获得他所希望的结果。他的局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时代的局限，是中体西用还是全盘西化，抑或是中西调和，是中国近代社会一直在探讨的重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书中所述不啻是对如何从借取西方文明来改造旧传统的一种检讨，在中西二元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上有益于增加我们的认识。最初这本书被译做《西学东渐记》流传大半个世纪，说明译者切中肯綮地认识到了这一

著述对中国社会的意义。

作为一部英文著述,《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因其内容主要与中国近代社会相涉而难以引起一般英语读者的兴趣,但是对那些欲了解中国的人来说——哪怕这样的人为数不多——容闳的这本传记是十分有价值的。时过境迁,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这本书对于了解中国近代史的意义仍然如此。另外,容闳落笔,虽然显出历史沧桑感,但还是有许多有趣之处,毕竟容闳出身平民,阅历丰富,透过他的眼睛看一件琐事,颇有一种捡拾贝壳之趣。譬如他对第一次归国的航海的描写、对刑场的描写等,莫不栩栩如生。他对人物的描写,也总是于寥寥几笔之中给人留下鲜明印象。此全赖作者在描写与叙述上的安排之妙。